

网络欺凌现象与青少年网络欺凌的法律预防

陈美华 陈祥雨^{*}

[摘要] 网络欺凌是青少年之间通过网络电子设备发生的,本质上是一种危害极强的侵犯行为。我国青少年网民数量庞大,网络欺凌可能对这一群体造成严重且持久的伤害,因此网络欺凌现象必须受到重视。在概念上,网络欺凌与网络暴力存在一定的混淆,辨析这两个概念是深入研究网络欺凌的重要前提。大数据技术使得从通讯数据中获取欺凌行为的关键信息成为可能,进而为预防工作提供了基础性的源数据支撑。不过,从保护隐私与信息监控方面来看,大数据技术需要配套的法律法规进行监督与执行,于是语言政策对青少年网络语言安全的保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网络欺凌;网络暴力;大数据;青少年健康;法律预防

语言欺凌在网络化时代具有一定的蔓延趋势,网络欺凌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利用大数据记录青少年网络行为是保护青少年在信息时代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针对网络欺凌现象,需要强化社会治理和法律规制,积极推动用大数据监控网络欺凌的常态化与法制化。

一、语言欺凌在网络时代蔓延的必然性

欺凌的本源是人类的竞争性。人类个体如同动物一样,也在食物、领地、配偶等资源面前表现出竞争;但是在高级社会法则,即现代文明规范的约束下,人类个体对资源的争夺以影响力、货币、名誉等社会筹码来间接展开。这种社会筹码因其竞争属性,在人类个体之间必然朝着不平衡的方向发展,以致形成两级分化。在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自由与平等”的社会理念被广泛弘扬,从而对发展不平衡的态势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仍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其存在与影响。

竞争双方的强弱失衡是定义“欺凌”行为的核心特征。欺凌对应的英文是“bully”。Stopbullying.gov是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管辖的一个官方网站,网站名称的字面翻译是“阻止欺凌”。此组织对于欺凌(bullying)的定义是,学龄少年遭受到来自同伴的一种侵犯性的(aggressive)行为;施加方与受害方之间存在身体素质或心理感受上的强弱失衡(power

^{*}陈美华,管理学博士,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1189;陈祥雨,东南大学外语学习中心研究人员、讲师,211189。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青少年网络语言暴力症候群诊断与对策研究”(14YYA001)成果。

imbalance);这种行为反复(repeated)发生或者有可能反复发生;被欺凌者、欺凌者和欺凌目击者都可能因此面临严重且持久的健康问题。

欺凌行为涵盖范围十分广泛,青少年的日常行为需仔细审视以预防欺凌。一般来说,欺凌行为分为三类:言语欺凌(verbal bullying)、社交欺凌(social bullying)和肢体欺凌(physical bullying)。言语欺凌指通过口头或书面的方式表达一些恶意、侮辱性的事物,包括取笑、辱骂、嘲笑、威胁、使用下流字眼等。社交欺凌指损毁别人的声誉、破坏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包括造谣、刁难、孤立他人等行为。肢体欺凌指伤害他人的身体或破坏别人的物品,包括常见的拳脚伤害、冲他人吐痰、故意夺走或损坏他人物品、做下流的姿势或手势,等等。这些常见的行为都属于欺凌行为,忽略这些行为而不加以制止矫正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欺凌行为产生的危害具有双边性,表现为欺凌者和被欺凌者都会受到伤害。被欺凌者可能面临身体、心理和学习等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他们可能感到心理压抑或焦虑,丧失合理的生活作息规律,遭受身体疾病,产生厌学心理以致逃课或逃学,最终学习成绩下降,等等。欺凌者在青少年时代会有斗殴、辍学、过早性行为等不良倾向;在成年后可能表现出酗酒、药物滥用、违反交通规则、甚至虐待配偶或子女等犯罪行为。欺凌目击者也会感到压抑或焦虑等心理负担,因而产生吸烟、酗酒、用药等有害健康的行为,最后有可能导致逃学或辍学现象。

青少年处于自然属性消退与社会属性养成之间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受到的欺凌会对其整个人生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青少年尚未完全理解与掌握成年人在社会交际中所采用的一些手段,在对“个体之间不平衡性”的规避上难免做得不足,甚至会有意为之,不加掩饰的来扩大这种不平衡以寻求“优越感”,“欺凌”现象也就由此而生。当今社会,网络已经成为主要的交流场所。“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人们既可以像在现实空间中那样即时交流和反馈信息,也可以像传统传播媒介那样使得信息在全社会范围内传播,还可以像在非法宣传空间中那样肆意发表言论。”^①青少年作为新兴事物的先锋尝试者与推广者,对网络技术的利用频度是巨大的。于是,欺凌行为在网络世界中寻找到了生存土壤并呈现出蔓延趋势。

网络时代必然放大与加剧了“强弱失衡”效果,对网络欺凌的滋生起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在网上,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文字或多媒体来展示个体的优越性,也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中进行任意的言语攻击与反击;在网上,由于“信息流瀑”的影响,人们戏剧化地受到已经作出选择的他人的影响,屈从于多数人的意见,而接受他人的意见^②,从而使得一些网络谣言“漫天飞舞”。匿名性作为某些网络应用的特点,使得人们在发布信息时可以不计后果与不负责任,这势必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竞争的频度与程度。同时,互动性作为大多数网络应用的又一个特点,可以将相关的或不相关的网民迅速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不同的舆论阵营,使言论的影响力甚至破坏力急剧提升。青少年的判断力尚不成熟,但其数量却在网络使用群体中占有较大的比例。社会对网络的这种“放大竞争”的能力若不加以监管,青少年便会更多地受到网络舆论中不良信息的影响,甚至参与到不良网络行为中去。

国家需在语言政策层面对网络语言行为进行监管。语言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对语言文字的“地位、发展和作用所作的行政规定”,如对“官方语言、广播媒体语言、教学用语言”^③的规定等。网络属于通讯媒体,对通讯媒体中语言行为的法规等应当落入语言政策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五条提到了在“信息技术产品”中使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

①杨嵘均:《网络空间公民政治情绪宣泄的刺激因素与政治功能》,《学术月刊》2015年第3期。

②何雨、陈丽君:《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③陈美华、陈祥雨:《从英语高考改革看当前我国语言政策规划》,《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五十七条第七、八款涉及了“暴力”与“侮辱他人”等内容,但两者均未对网络语言侵权行为做出详细规定。大数据对青少年网络欺凌信息的处理,涵盖了信息安全、个人隐私、青少年心理健康等多方面的内容,国家不仅应从语言政策上更应从法律规制上对此进行具体明确的界定和预防。

二、网络欺凌与网络暴力概念使用的法律规范度

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概念具有字面意义上的直观性,即发生在网络环境中的欺凌行为。网络环境包括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设备,也包括社交网站、短信、电子邮件、聊天工具等通讯手段。与传统欺凌相比,网络欺凌因其“高度的匿名性和隐蔽性,再加上被欺凌者大多保持沉默”,所以其“途径更多,实施更易,约束更少,监控更难,传递更快,波及更广,持续更久,伤害更深”^①。

青少年群体是网络欺凌行为发生的重灾区。相比传统欺凌,网络欺凌会对青少年被欺凌者带来更大的伤害。因其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发生,网络欺凌引发了众多的不安因素。例如,若被欺凌者在休息时受到骚扰,便有可能遭受失眠之苦;再如,被欺凌者在马路、水边、轨道等危险地点受到网络欺凌,便会面临潜在的生命威胁。不仅如此,网络欺凌为匿名欺凌带来了滋生空间。很多情形下,现代科技不能轻易的甚至不可能追踪到匿名欺凌的来源,这就为预防网络欺凌带来了困难。以网络欺凌为目的的不良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往往使得预防与补救措施无法进行,很多不良照片、视频等一旦发布出去便无法收回,对受害者造成的创伤是永久性的。

网络欺凌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了极大的威胁。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对全国9—12年级的中学生(约14—17周岁)进行调查,14.8%的学生都曾经在邮件、短信、聊天室、网站中遭受到了网络欺凌(electronically bullied)^②。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对全港1800名中一至中七(相当于内地的初一至高三)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网络欺凌的整体受害率为30.9%^③。2012年,我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3560个6—24岁有上网经历的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显示,95.4%的受访青少年表示曾经遭遇到不同形式(含网络欺凌与其他暴力内容)的网络暴力。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欺凌有可能呈现同规模增长的趋势,我们必须利用网络科技这同一把“双刃剑”对其进行防治。

澄清“网络暴力”和“网络欺凌”两个概念的区别,是界定侵犯后果责任的前提,也可提高青少年网络不良行为法律预防的针对性。在国内的各类新闻报道中,我们也常常遇到“网络暴力”这一术语,各种网络暴力事件也同样可能给青少年带来伤害。那么“网络暴力”与“网络欺凌”之间是否可以等同呢?如果将“网络暴力”一词的外文名译为“Cyber-bullying”,并将网络暴力定义为一种“暴力形式”,是“在网上发表具有伤害性、侮辱性和煽动性的言论、图片、视频的行为”。这个定义中并没有提到施加方与受害方之间的“强弱失衡(power imbalance)”,而“强弱失衡”是bully行为的重要判别标准。所以,这里将“网络暴力”译为Cyber-bullying是不恰当的。

学术界与大众媒体目前并没有对“网络暴力”和“网络欺凌”的含义达成统一。江根源认为我国对网络暴力的研究集中在“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游戏”上而没有密切关注因“权力上的不平衡性”^④而产生的网络暴力行为,江根源将后者所描述的网络暴力译为cyberbullying,实际上指的就是“网

①陈钢:《网络欺凌:青少年网民的新困境》,《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年第4期。

②L. Kann, S. Kinchen & S. L. Shanklin, et al.,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illance—United States, 2013”, *MMWR Surveill Summ*, vol. 63, 2014, pp. 1—168.

③王文佳、王彭:《青少年处于网络欺凌“重灾区”》,《新民晚报》2013年08月21日。

④江根源:《青少年网络暴力:一种网络社区与个体生活环境的互动建构行为》,《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络欺凌”。而2013年8月10日中央电视台在题为“网络暴力导致青少年自杀事件频发”的新闻报道中提到“网络暴力是指人们利用互联网做出针对个人或群体的恶意、重复、敌意的伤害行为”，并且指出“近年来，青少年成为网络暴力的最大受害者”。同视频中一个英国青少年受害者的父亲提到了“get bullied on the internet”。再结合央视定义中的“重复”这一关键信息可以判断，这里的“网络暴力”其实也是指的cyberbullying，即“网络欺凌”。

此外，“人肉搜索”也被关联到“网络暴力”的讨论中，这引起了概念上更多的混淆。“人肉搜索”是指数目众多、背景广泛的网民根据事件的少量信息进行网罗式的人工问答搜索，最终找到事件当事人的真实身份并将其相关信息公布于网络。“人肉搜索”属于网络群体性事件，会给当事人的隐私、声誉等造成危害，也会使网络环境和社会群体心理趋于复杂。网民进行“人肉搜索”的目的可能是出于猎奇，也可能出于义愤。“人肉搜索”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一般都出现在其真实身份被搜索到之后。而“网络欺凌”的目的和伤害过程一般是伴随发生的。所以说，虽然“人肉搜索”被不少学者^①列入网络暴力的范畴，但其与网络欺凌并没有直接交集，需要根据实际案例来具体分析。

“网络欺凌”比“网络暴力”具有更高的概念明晰度。网络暴力与网络欺凌之间之所以会产生概念上的模糊，是因为两者都以现代网络为媒介，都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表面上，“暴力”一词更能涵盖到网络上的一些侮辱或辱骂性的言辞，更能使人联想到伤害后果。而“欺凌”这一词在口语与网络用语中并不如“暴力”来得常见。所以，“网络暴力”这一说法很容易从直观上理解，作为词汇使用起来也比较自然。仅仅从字面含义上看，“网络欺凌”行为包含在“网络暴力”的范围之内，但在讨论青少年之间的网络行为时，结合到国外cyberbully这个英文词汇，本文建议使用“网络欺凌”这一术语，以区分包括“人肉搜索”在内的其他网络中的社会性事件。

三、大数据监控网络欺凌的常态化与法治化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是基本资源，一切社会活动围绕数据，并由数据记录与反映。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社会各个层面信息化的进程，人类的生产生活中产生了体积庞大的数据。现代生活中包括手机、平板、电脑、穿戴设备等等在内的各种通讯终端，无时无刻不在采集和生成有关使用者的数据。在2013年，全世界1天中产生的信息就可以“刻满1.33亿张DVD光盘”^②。“大数据”是一个广义的术语，它是指一种数据集，其规模如此庞大、关系如此复杂，以至于传统的数据处理程序无从对其进行运算。特别地，“大数据”通常指从数据集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来进行分析预测的这样一种理念或方法，而很少用来指代某一具体容量的数据。

利用大数据来观察和预测社会活动必然成为信息时代的常态。网民数量的增加，和网民所持有通讯设备数量的增加，加剧了大数据时代的深化。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带宽与通讯速度的升级会使得大数据的产生更加来势凶猛。数据规模越大，对其处理的难度和开销就会越高。对大数据的处理包括捕获、存储、搜索、索引、移动、可视化、隐私处理等等。通过以上处理，大数据可深层挖掘的价值会变得无比巨大，很多数据通过分析之后，可以得到原始内容之外的信息，例如：社会舆情、经济趋势、生态变化、健康指数、教育需求，等等。这些拥有额外价值的信息，能够使管理者对自身领域中的关键节点进行预测与决策，最终提高了生产活动的效率。

利用大数据记录青少年网络行为是保护青少年在信息时代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2013年中国互

^①金君俐：《网络语言暴力的成因和对策初探》，《新闻实践》2009年第4期；余建华：《网络侵犯行为的三大运作特点》，《现代情报》2011年第31期。

^②邬贺铨：《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3年第3期。

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中显示，我国青少年网民（CNNIC定义为25周岁以下）数量为2.35亿人，占总体网民数量的41.7%。青少年网络行为的发生频率是极高的，因此产生的数据也是庞大且全面的，其中必然包含了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信息。就网络欺凌行为而言，显性信息包括欺凌双方的个人信息、欺凌内容、时间、地点、起因，等等，隐性信息就涵盖了欺凌双方的家庭背景、教育阶段、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等与某一次欺凌行为并不直接相关的信息。通过显性和隐性信息的综合，可以对欺凌行为的易发个体和群体进行分析，寻找产生网络欺凌的深层动机和预防措施。

对青少年使用的上网终端设备应从源头上加强监管。获取网络信息的途径是已知的，无非是有线接入与无线接入。有线网络接入分为家庭内接入和家庭外接入。青少年在家庭内的上网行为需要家长的监督，在家庭外如网吧等场所需要网络经营者严格按照法律进行实名登记，禁止未满18岁的青少年在无监护的状况下自由使用网络。无线接入因具有随时随地可以连接网络的特点，相比有线接入更难控制一些，但我们仍然可以在青少年购买和持有无线上网设备上采取措施。例如，青少年需在监护人的陪同下购买移动设备、监护人需签署青少年监护责任书对其行为进行约束、青少年在校内使用移动设备需进行登记，等等。移动设备制造商也可以根据青少年的学习与生活需求研制出“儿童手机”、“学校手机”等产品来从硬件功能上限定青少年对移动设备的使用。

法律法规应当对网络敏感语言进行强制过滤与阻塞。屏蔽分为部分屏蔽和全部阻塞。部分屏蔽指将信息的某一片段进行屏蔽，而仍然可以将信息传达到对方。例如，文本信息中若包含辱骂性的字眼，信息在显示时会将其用星号或其他表情符号代替；图像信息中若包含人的面部或其他敏感部位，通过生物识别技术可以将其进行模糊处理。全部阻塞指当信息中被检测出疑似不良内容时，整个信息无法传送，对方也就根本无法接收而免受其害。目前常见的敏感词文本屏蔽技术已经比较普遍，但屏蔽精度与屏蔽的智能化程度还远远不足以控制全部的网络欺凌行为。那么，大数据的出现恰恰为敏感信息的判断与预测技术发展提供了源数据支持。不过，此类技术在所有的通讯终端中的应用，不能仅仅依靠软硬件开发商的道德约束或自觉遵守，必须以法律法规强制执行的方式才能得到保障。

利用大数据科技对网络欺凌发生的环境进行预测进而重点防范。当网络欺凌行为发生以后，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事件中提取相关的人物、时间、地点、原因等显性信息与当事人家庭教育背景等隐性信息。通过大数据技术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和模型训练之后，我们就能够掌握网络欺凌事件发生的规律，从而尽早做出防范措施。例如，通过分析网络欺凌事件发生的时间，我们可以从中判断课间、午休、晚饭、就寝前等时间是否为事件高发时刻；再如，通过分析事件发生的日期，可以判断假期、开学、考试等是否为事件高发阶段；再如，通过对无线设备的GPS定位技术，可以判断教室、操场、公交站、家庭、图书馆等场所是否为事件高发地点。当然，欺凌事件信息的收集需要专门的大数据软件系统来完成；此类软件的开发涉及到个人隐私、信息权限、技术标准等一系列详细的问题需要进行研究。

加快网络语言立法进程并成立相关社会组织来预防网络欺凌。网络欺凌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现象。美国虽然没有在联邦层面对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行为进行立法，但其所有的州都拥有与网络欺凌相关的法令（laws）或条例（model policies）；当欺凌行为中涉及种族、肤色、出身国、性别、残疾或信仰等内容时，这些法规还有可能与骚扰伤害（harassment）相关的法律重叠，美国法律系统会对其做进一步处理。不仅如此，美国存在诸多专门针对欺凌行为的，来自官方或民间的网站组织，如www.stopbullying.gov，cyberbullying.us，nobullying.com，等等。这些网站为青少年和家长提供建议、培训、案例、咨询、医疗与法律等相关信息，对网络欺凌行为的预防和补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相比

之下,我国对青少年语言行为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了家庭、学校和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责任与义务,但并没有明确提出青少年群体之内发生的语言侵害事件的法律处理。此外,我国也并没有足够数量的旨在预防青少年网络欺凌的组织来为受害群体提供指导。因此,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相关法治政策的完善与社会团体的建设在我国都尚需进一步努力。

教育法中应提升青少年身心素养教育的地位,规定学校在教学中对欺凌行为相关的问题进行教育引导。鉴于人类个体发展的绝对不平衡性与人类社会活动中的竞争本质,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欺凌行为是不可能的。正如侮辱性的字词不可能从语言中消失,反而在语言学中被用来研究语言现象一样,欺凌行为也不可能从人类社会消失。这种负面的社会现象从某种意义上维持着人类社会的完整性,也为我们认识自身提供了一种路径。不过,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把欺凌行为带来的伤害降到最低。网络只是欺凌行为存在的一个环境,通过限制环境来控制欺凌行为似乎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不仅如此,强行限制青少年对网络设备的使用,从某种意义上也有损青少年享受现代科技进步的权益,会影响青少年的自由成长。于是,通过对青少年进行引导式教育,让欺凌的施加方认识到自身的错误,让受害方建立起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营造出青少年健康良好的社会成长总环境,才是杜绝欺凌行为的根本所在。

四、结语

青少年是未来社会的血液与脊梁,是需要进行全方位保护的对象。随着我国社会网络信息化的全面到来,网络欺凌现象对我国青少年的危害也日益显现。网络欺凌不仅对青少年现阶段的成长带来威胁,也对其成年以后的生活状况产生负面作用,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运作发展。大数据时代为网络欺凌的预防同时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利用大数据方法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跟踪、分析与预测是保障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重要工作。同时,我们也需要加强网络语言政策的积极引导,明晰网络语言侵害行为的法律责任范围,监管青少年网络数据的合法利用与开发,通过立法进程、社会力量、素养教育等多维度的举措来推动网络欺凌预防事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杨嵘均)

Cyberbullying and Its Legal Prevention among Teenagers

CHEN Mei-hua, CHEN Xiang-yu

Abstract: Cyberbullying is a serious offence that happens among teenagers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The number of teenager internet users in China is huge, to whom cyberbullying could cause serious and persistent harm.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pay due attention to this type of bullying.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cyberbullying, certain confusion about the concepts of cyberbullying and cyber violence exists, and thu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is necessary. The big data technology makes it possible to obtain key information of bullying behaviors i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which can provide data source for the prediction and prevention of cyberbullying. To accomplish this, the issues of privacy protection and information surveillance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refore, the language policy plays a crucial part in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the internet language security for teenagers.

Key words: cyberbullying; cyber violence; big data; teenagers' health; legal prevention